

（二〇一七年三月二十日出版）

本期目录

【研究综述】	“十七年”：不同时代的不同叙述和记忆	金光耀
【史实考证】	《断崖夜斗杨人梗》实地考	樊能廷
【往事非烟】	“特种兵”的晚岁思考	张宝林
【书刊评论】	《文革时期中国农村的集体杀戮》中文版序	苏 阳

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浏览，网址为：<http://museums.cnd.org/CR>。

【研究综述】

“十七年”：不同时代的不同叙述和记忆

• 金光耀 •

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算起，毛泽东领导中国27年。因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这27年可以被分为两个时段，即“文革”十年（1966—1976）与“文革”前的“十七年”（1949—1966）。“文革”十年被普遍认为是一个大动乱的年代，与之相比，对毛泽东领导下的“十七年”却没有像“文革”十年那样容易加上一个定语。“十七年”间没有“文革”时期那样波及全国范围的大规模内乱和中央最高层领导的急剧变动，但在政治、经济、社会等各领域也经历了许多风风雨雨。“十七年”间由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群众性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从未中断，举其大者有：土改、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农业合作化、反右、大跃进、人民公社、反右倾、社教。其间还有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造成的经济困难，以及由此导致的范围极广的饥荒。也在这期间，中国的工业化取得了明显的进展。但如何看待这“十七年”，在当今的中国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而对这“十七年”的认识，与对晚年毛泽东的认识和整个共和国历史的认识紧密相连，因此这是一个十分重要而有意义的话题。对“十七年”的认识及由此产生的关于“十七年”的历史叙述始于“文革”期间，从那时起到今天，40多年来有各种不同的关于“十七年”的历史叙述和记忆，但学界对此尚未展开专题讨论。本文试图按“文革”时期、改革开放初期、共和国成立六十年前后这三个时段，梳理有关“十七年”历史的叙述和记忆，并初步探讨这些历史叙述和记忆形成的原因。

◇ “文革”期间有关“十七年”的叙述

关于“十七年”的话语始于“文革”期间，但其源头可上溯至“文革”爆发前。毛泽东发动“文革”的主要动因是对当时中国现状的不满，这种不满是对自1949年以来的“十七年”间存在着的与他相左的政策及其推行者的不满。毛泽东的这种不满在“文革”前就有明显的表达，他关于文学艺术的两个批示就是例证。1963年12月12日，毛泽东在中宣部文艺处所编的《文艺情况汇报》上写了一段批语，认为“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

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但其中的问题也不少。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社会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1〕1964年6月27日，毛泽东针对文联和文艺界各协会又写了一个更为严厉的批示，明确表示“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2〕毛泽东的这两个批示表达了他对1949年以后文艺界状况的基本判断，即文艺界没有执行他所倡导的正确的政策，却让错误的政策占据了主导地位，由此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

毛泽东对1949年后文艺界的否定性看法成为稍后江青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的指导思想。这次座谈会的纪要提出，文艺界在建国后的十五年基本上没有执行毛泽东的正确政策，却“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3〕稍后，林彪在为此座谈会纪要写给中央军委常委的信中沿袭了这一说法：“十六年来，文艺战线上存在着尖锐的阶级斗争，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没有解决。”〔4〕

上述这些话语，因为时间关系，分别用了“十五年”或“十六年”的表述，但其意思是明确的、一致的，毛泽东以及在他影响下的江青、林彪都坚信，1949年后在文艺界存在着与毛泽东的正确政策相左的“黑线专政”。这一认识成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动因，而这些话语也影响了整个“文革”时期，成为“文革”时期关于“十七年”历史叙述的源头。

1966年的10月1日是共和国十七周年的国庆节。在当天天安门广场的集会上，已成为中共第二号人物的林彪代表中共中央致词时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七周年，这是不平常的十七年。在我国，是翻天覆地的十七年。……中国人民在短短的十七年间，完全改变了过去的面貌。这是毛泽东同志领导的中国人民群众的丰功伟绩。”〔5〕《人民日报》的国庆社论对1949年以后的十七年也作了相同的表述：“十七年来，我国人民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战线上，都取得了突飞猛进的胜利。”〔6〕因为是共和国成立十七周年，“十七年”这个时间概念第一次出现在中央领导人的讲话和党报的文章上；也因为是在庆祝国庆的喜庆节日里，对“十七年”的评价突出的是“突飞猛进的胜利”。

但对毛泽东来说，“十七年”是肯定存在严重问题的，否则就没有必要发动“文化大革命”了。因此1966年国庆节后不久，毛泽东于10月下旬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开宗明义就指出，“十七年来，有些事情，我看是做得不好，比如文化意识方面的事情。”但与1963、1964年的两个批示只是讲文艺界的问题不同，在毛泽东的这个讲话中，“文化意识方面”只是十七年存在问题的一个方面，除此之外还有许多甚至更严重的问题，比如“出了相当多的独立王国”。〔7〕在这里，毛泽东显然是出于政治考虑强调“十七年”间存在的问题，着眼点是进一步推进“文革”的政治运动。所以，毫不奇怪，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之后，“文革”就进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阶段，不久就公开批判刘少奇了。

向“十七年”吹响进攻号角的是1967年3月底发表的戚本禹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一文。这篇经过毛泽东审阅的长文，是在中央级报刊上第一次公开却不点名地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即刘少奇，文章的结尾部分写道：“十七年来，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支持下，向无产阶级发动了一个全面性的猖狂进攻，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各个领域里放了大量的毒。”〔8〕

这一断言显然是毛泽东两个文艺批示和《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的延续，只是涉及的领域扩展到了文艺之外的政治、经济等领域。

紧接着在4月上旬，《人民日报》发表编辑部文章《高举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批判旗帜》，进一步猛攻“十七年”来以刘少奇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该文指出：“十七年来，正是这个中国的赫鲁晓夫，在文学、史学、哲学、政治经济学、教育学、新闻学等各个领域，在党、政、军、工、农、商、学各界，扶植和保护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一小撮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散布了大量的修正主义毒素。”“十七年来，一条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条以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党内进行着尖锐复杂的斗争。”〔9〕

在戚本禹和《人民日报》编辑部的文章中，“十七年”间被认为存在着“一条以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这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流毒遍及党、政、军、工、农、商、学各界，影响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各个领域，危害极大。至此，关于“十七年”黑线的话语就被制造出来，“十七年”也就与“一条以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连在一起，而原先渲染的“十七年”间取得的“突飞猛进的胜利”则出于故意的忽略而被遗忘。制造这样的话语，当然是为了表明“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因此，刘少奇的被打倒也就被欢呼为“文革”的伟大胜利。

此后直至“文革”结束，“十七年”实际上从一个时间概念转化为一个政治概念，被频繁使用。而“十七年”黑线成为关于那个时段的标准的历史叙述，成为动员群众批判刘少奇“黑线”、积极参加“文革”的重要手段。

1971年4—7月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形成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这份纪要对关于“十七年”的历史叙述，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纪要》对“十七年”作了一个被称之为“两个估计”的基本判断，即十七年来“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十七年”来资产阶级“竭力使学校成为培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场所”，教师中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10〕根据这一判断，“十七年”来在教育界存在着一条资产阶级黑线。《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是一个影响超越了教育界的文件，因此《纪要》的判断和用语被推广运用于教育界之外，于是就有了“文艺黑线”、“科技黑线”、“体育黑线”等等的黑线，而在各个领域的黑线之上是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相对抗的以刘少奇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条资反路线贯穿于整个“十七年”。在这样的历史叙述中，“十七年”间只有毛泽东的革命路线和刘少奇的资反路线两条对立的政治路线，与这两条路线斗争无关的事件都无法进入历史而被遮掩掉了。可以说，《纪要》的出台标志着“文革”期间关于“十七年”的历史叙事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理论形态。

由于“十七年”成为一个具有特定政治含义的词汇，当“文革”后期以邓小平为代表的重新上台的老干部与“四人帮”展开较量时，对“十七年”的看法也成为双方交锋的一个重要方面。“四人帮”在他们所控制的报刊上，公然喊出“坚决同十七年对着干”的口号，矛头直指“文革”前掌权的老干部。而老干部则鲜明地表示，“同十七年对着干”的说法是错误的。〔11〕

“文革”期间，毛泽东的话“句句是真理”，而整个舆论工具又都在“四人帮”的控制下，因此关于“十七年”的历史叙述呈现一边倒的态势。在这样的舆论环境下，“十七年”也就完全等同于刘少奇的“黑线”，从而形成了民众对“十七年”的集体记忆。

◇ 改革开放初期关于“十七年”的叙述

1976年10月，“文革”在“四人帮”被抓起来后结束。在“拨乱反正”的方针指引下，“文革”期间盛行的理论和口号成为揭批“四人帮”的主要内容，他们所鼓吹的关于“十七年”的话语理所当然地在猛烈批判之列。

“同十七年对着干”由此被认定为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极右派口号”，而揭批“四人帮”，就是要与“四人帮”对着干，对“十七年”的叙述也就由此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四人帮’恶毒攻击‘十七年’，我们就要热情歌颂‘十七年’。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是我国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中的重要时期。这十七年，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蓬勃发展的十七年，是无产阶级专政日益巩固的十七年，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断取得胜利的十七年。”对“十七年”的认识和评价也被提到一个十分重要的政治高度：“对十七年的历史能否给以正确的估价，对于我们来说，这是一个关系到要不要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要不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大是大非问题。”〔12〕

在“四人帮”被打倒后的一两年时间内，对“十七年”这样的认识和叙述成为报刊的基调。例如，在1977年11—12月的两个月中，《人民日报》上以“不许‘四人帮’否定十七年”为主题的文章就有十篇之多。而直到1978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这样的话语仍是报刊的主调。在一篇题为“北京市委部署加快步伐抓纲治市”的报道中，是这样来谈北京市的“十七年”的：“北京市的十七年，同样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直占主导地位。文化大革命前，北京市委的工作，成绩是主要的，北京市绝大多数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13〕显然，刚从“文革”中走出来的人们还沿袭着“文革”时的思维定式，要把被“四人帮”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于是“十七年”成为要“热情歌颂”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蓬勃发展的十七年”，而将“十七年”说成漆黑一团则成了“四人帮”的重要罪状之一，尽管如前节所显示的，“十七年”黑线说的始作俑者并不是“四人帮”。经过这样政治上的拨乱反正，有关“十七年”的历史叙述完全翻转过来了。而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愿意接受这样的历史叙述是与刚过去的“文革”十年的动乱相关的，于是“十七年”在与“文革”的对照中，留给人们的记忆就是社会主义革命尤其是建设的“蓬勃发展”了。显然，“十七年”仍然是一个具有强烈政治含义的词汇。

但经过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实事求是之风日益兴盛，人们摆脱把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的思维模式，开始反思包括“十七年”在内的共和国历史。中国共产党对包括“十七年”在内的共和国历史的初步反思和总结，体现在叶剑英代表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稿中。这篇由中共中央组织起草、经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的讲话稿，对1949年至1979年的三十年历史作了一个基本估价，那就是“在过去三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我们的路线是正确的。”讲话稿专门讲了“十七年”：“建国以后的十七年中，我们坚持了四项基本原则。尽管我们在工作中也犯了一些严重错误，但这些错误一般地还是能够在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来纠正的。”〔14〕与揭批“四人帮”初期一味地“热情歌颂”“蓬勃发展的十七年”、“不断取得胜利的十七年”相比，此时对“十七年”看法的一个明显变化，就是初步认识到中共在这期间“也犯了一些严重错误”，原先被忽略的历史终于被提及了。

在中共党内讨论这篇讲话稿时，有一些人对“十七年”的后十年即1957—1966年这一时期已有不同看法，对毛泽东的左倾政策提出了比较尖锐的批评。当时还有人提出，社会主义改造搞早了，应该回过头去补新民主主义的课，实际上是通过对其政策的反思表

达了对五十年代中期后共和国历史的看法。（15）但叶剑英的讲话稿最终仍然以基本肯定的口吻来谈论包括“十七年”在内的“三十年”。负责这篇讲话稿起草的胡乔木在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上对此专门作了解释。他说：“直到1966年以前，整个党和国家的工作一般还是在正常进行，国民经济还是在继续好转。所以，对于十七年的后半，需要具体分析，不能够简单地认为是执行了或是一直执行了错误路线。那样说，会使得我们对于整个党的力量，整个党的组织，整个党的领导失掉信心。”显然，在胡乔木看来，对“十七年”的认识不仅是一个历史问题，更是一个现实政治问题，所以一定要由党来定一个基调，统一人们对此的认识：“在这个问题上如果不划一道杠杠，势必要动摇党在人民中间的威信，势必要动摇群众尤其是青年对党的信心。”（16）需要指出的是，对“十七年”的不同看法主要围绕着1957—1966年这十年间。

但叶剑英的讲话并未能统一人们对共和国历史的看法，反而不同看法之间的分歧和对立还在扩大、加深。于是中共中央决定起草一个关于共和国历史的决议，以“总结经验，统一思想，团结一致向前看。”（17）这个决议的起草工作从1980年3月开始，由邓小平、胡耀邦主持，胡乔木负责起草。决议起草之初，邓小平就提出了三个基本要求：一、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二、对建国后三十年历史上的大事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做出公正的评价；三、总结宜粗不宜细，总结过去是为了团结一致向前看。（18）10月，党内四千高级干部对决议草案进行了大讨论，“十七年”自然是这场讨论的焦点之一。决议草案延续了叶剑英讲话稿的说法，提出在十七年中，多数情况下我们党的路线是正确的，取得了伟大的成绩。但许多高级干部不同意对“十七年”下这样的判断，认为“十七年”中政治运动不断，整了几百上千万人，“大跃进”又导致大饥荒，死了几千万人，这都是毛泽东的左倾路线造成的，而草案还在为毛泽东的错误辩护，这些高级干部对此表示坚决的反对。（19）

但邓小平并不赞同这些高级干部对“十七年”和毛泽东的评价，认为他们“对毛泽东同志有些问题的议论讲得太重了，应该改过来。”（20）在决议起草过程中，邓小平多次表明他对“十七年”的看法，提出：“总之，建国后十七年这一段，有曲折，有错误，基本方面还是对的。”“建国头七年的成绩是大家一致公认的。我们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搞得成功的，很了不起。……‘文化大革命’前的十年，应当肯定，总的是好的，基本上是在健康的道路上发展的。这中间有过曲折，犯过错误，但成绩是主要的。”（21）邓小平对“十七年”总体上是肯定的，尤其对前七年给予很高的评价，而对后十年则承认出现了曲折与错误。

由于邓小平在中共党内的地位，他的意见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定下了基调。《决议》将“十七年”分为“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七年”和“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在前七年中，“党确定的指导方针和基本政策是正确的，取得的胜利是辉煌的。”这些辉煌的胜利包括迅速恢复国民经济和完成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在后十年中，“我们虽然遭到过严重挫折，仍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成绩表现为“我们现在赖以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很大一部分是这个期间建设起来的；全国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的骨干力量和他们的工作经验，大部分也是这个期间培育和积累起来。这是这个期间党的工作的主导方面。”至于出现过的严重挫折有1957年的反右、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1959年的批彭德怀事件、1959—1961年的严重困难、1962年提出的阶级斗争扩大化观点、1963年以后意识形态领域的政治批判等。《决议》认为，“这十年中的一切成就，是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集体领导下取得的。这个期间工作中的错误，责任同样也在党中央的领导集体。”（22）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于1981年6月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通过。全会的公报指出，“《决议》的通过和发表，对于统一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

思想认识，同心同德地为实现新的历史任务而奋斗，必将产生伟大的深远的影响。”〔23〕此后围绕《决议》的宣传，强调了它对统一全国认识的巨大作用。如《瞭望周刊》发表的编辑部文章，称赞《决议》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深得党心、军心、民心”，“必将进一步统一全党的认识，增强全党的团结”。〔24〕

《决议》通过后，舆论有关“十七年”的历史叙述出现一边倒的说法，而在中共党内讨论时出现的不同意见则被对《决议》精神的阐发和解释所淹没。《决议》的相关论述成为此后主流意识形态关于“十七年”历史叙述的标准说法，这种标准的历史叙述不仅出现在党的文件、党报和党刊中，也出现在从小学到大学的各类政治、历史教材中，构成普通民众对“十七年”记忆的基础。

◇ 近年来关于“十七年”的叙述

《决议》没有也不可能停止人们对“十七年”的思考。近年来共和国历史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因为现实社会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促使人们回过头去，从刚过去的历史中寻找答案，或者说通过对共和国历史的解释来回应现实中的各种问题，由此出现了历史与现实间的双向互动。由于人们对现实社会有着不同或截然对立的看法，因此对“十七年”的看法也呈现出多元解释的格局。这里仅聚焦于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前后，概要展现当今中国社会对“十七年”的一些主要看法。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共和国已走过一个花甲的历程，而最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又使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因此人们在回首共和国历史时，更多地以1979年为界，将前后两个三十年进行对比，所以对“十七年”的看法通常也就包含在对前三十年的看法中。而“十七年”在大多数叙述和一般民众的记忆中消失，说明它已失去其曾有过的政治含义。〔25〕

主流媒体对“十七年”的看法延续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精神。这里以《人民日报》上发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朱佳木关于“正确认识新中国的两个三十年”的谈话为例。在这篇谈话中，朱佳木谈了他对包括“十七年”在内的前三十年的看法。他引了《决议》中对1957—1966年这十年的评价“我们现在赖以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很大一部分是这个期间建设起来的；全国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的骨干力量和他们的工作经验，大部分也是这个期间培育和积累起来”来概括前三十年所取得的成就，并特别强调改革开放就是在这基础上起步的。他也承认前三十年犯过错误，有些错误是全局性的，但更强调其基本方面是取得了历史上所没有取得过的进步，将包括“大跃进”、“文革”这样的严重错误与这些基本方面放在一起比较，“孰重孰轻、什么是主流什么是支流，就会看得很清楚。”〔26〕因此，包括“十七年”在内的前三十年应该给予基本肯定的评价。而针对社会上对“十七”年间一些史事如饥荒引起的死亡持批评立场的看法，《红旗文稿》上有文认为这是“编造和夸大所谓‘人祸’，杜撰出毫无根据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因此是“历史虚无主义”。〔27〕当年起草《决议》时肯定“十七年”主要是为了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而如今肯定前三十年主要着眼于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用朱佳木的话说，“因为，否定了那三十年，就无法解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来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的科学社会主义灵魂就会被抽去。”他还特别指出：“我们过去批判过‘四人帮’从‘左’的方面对新中国头十七年的否定，今天同样要抵制从右的方面对新中国头三十年的否定。”〔28〕

主流媒体之外，对包括“十七年”在内的前三十年或者说毛泽东时代则有出自不同立场的各种不同的认识。辛子陵在《红太阳的陨落》这本讨论毛泽东后半生的书中，通过对毛泽东的评价表明了对“十七年”的看法。他认为1953年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后，毛泽东抛弃了新民主主义建国理论，一个左转弯走上了空想社会主义道路，接着发动大跃进和公社化

运动，酿成饿死几千万人的大惨剧，而毛泽东此后的种种政治举措直至发动“文革”，都是为了掩盖饿死人这个空前绝后的大错误。因此这是一个由一连串的错误构成的“十七年”：从1953年以后是一个错误接着一个错误，六十年代以后的错误则是为了掩盖之前发生的错误。这些错误的根源是毛泽东的空想社会主义。（29）

但也有学者认为这样解读包括“十七年”在内的毛泽东时代过于简单化了。他们将“十七年”和毛泽东时代置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背景下，以制度现代化的逻辑进行审视，认为“1949年中共建政，1953年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乃是一个社会发展路径选择的方向性错误”，因为这一路径选择“在政治—经济—社会的制度建构意义上，其实背离了现代文明的根本原则”。他们对毛泽东的选择作出自己的解读：“作为共产党人，毛有其独特的社会理想。他并不满足于仅仅夺取政权做一个太平皇帝。他还要奋斗去建设一个既符合马克思主义理念、又符合中国人‘大同’理想的‘人间天堂’，并以此为世界人民做出榜样。”但“无论那一代人多么真诚，为这样一个选择付出多大的牺牲，错误的全局性和根本性已经被迄今为止的历史所证明。”（30）因此这是一个虽有理想追求，但其实际结果却背离现代文明的“十七年”。就其追求“人间天堂”的理想而言，这是一个失败的“十七年”。

还有学者从社会经济发展的角度讨论“十七年”在内的毛泽东时代，认为“革命胜利后，党没有从一工作中心为阶级斗争的革命党转变为一工作中心为搞经济建设的执政党，对怎样搞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并不熟悉，榜样上学习了苏联模式，而且在资源配置方式上实行了计划经济，生产资料所有上采取了一大二公的国有制、城镇集体所有制和农村人民公社社队体制，对外关系上走了自我封闭的道路”，因此，在1949年后的三十年间，中国“与整个世界各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差距越来越大。”对这三十年的总体评价是，“我们走了弯路，延误了时机，可以说，成绩为三，问题为七。”（31）

近年对“十七年”和毛泽东时代予以全面肯定的声音也十分引人注目，这主要出现在网络中，而以网站“乌有之乡”最具代表性。“乌有之乡”的文章许多出自非专业学者，表达直截了当。在谈到“十七年”史事时，该网站的文章基本给以肯定的评价，即使《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已明确的“严重失误”如“大跃进”，网站上也有系列文章为之辩护，标题非常直白：“大跃进的基本思想和成绩不容抹杀”。在他们看来，大跃进使中国现代工业取得了进步，因此“毛泽东时代是中国现代工业革命的时代”。更有作者在该网站撰文称毛泽东时代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最为光辉进步的人间仙界”。（32）这个网站中出现的包括“十七年”在内的毛泽东时代是一个“公平、正义、平等、自由”的社会。（33）

概而言之，上述不同的历史叙述使“十七年”或者说毛泽东时代在当今中国人中间形成了色彩斑驳甚至截然不同的历史记忆。这种多元叙述反映了现实社会中的利益分化，除了少数严谨的学者，不同的群体大都基于自身在当今社会的境遇和体验去回观“十七年”和毛泽东时代，从而从自己当今的视角和立场描绘出不同的“十七年”和毛泽东时代。（34）这种多元的历史叙述使得人们对“十七年”会有选择地记住一些历史事件，同时也有选择地遗忘一些历史事件，尤其对那些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的年轻人来说，更是如此。

◇ 余论

历史记忆是通过对历史事件的叙述形成的。在当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在对历史事件的叙述中总是起着决定的关键性的作用。具体到本文讨论的三个时段对“十七年”历史的叙述，主流意识形态所起的作用因时代变化而前后略有不同。在“文革”时期，主流意识形态

一统天下，不容任何异端出现，因此对“十七年”历史的叙述呈一边倒的态势。“文革”结束后的改革开放初期，主流意识形态仍决定着有关“十七年”历史的叙述，但由于思想解放运动引发的对历史的反思，有关“十七年”历史出现了与主流意识形态不同的声音，但在主流的宏大叙事前显得轻微而终被淹没。近年来，主流意识形态仍主导着有关“十七年”历史的叙述，但已不是原先那种一统天下的局面，出现了各种不同的甚至与主流意识形态相对立的叙述。这从一个方面反映了近三十年来中国政治的变化，也反映了人们思想的活跃。

由于主流意识形态起着决定或主导的作用，党的文件和主流媒体的言论成为历史叙述的源头和最重要的传播渠道。例如“文革”中关于“十七年”黑线的话语，最初就源自戚本禹在《红旗》杂志上的文章和《人民日报》的编辑部文章，随后由《全国工作会议纪要》所加强而遍及全国。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则为八十年代后对“十七年”的历史叙述奠定了基调。这种由主流意识形态确定的历史叙述进而通过报刊、教材等传播至民众，从而形成人们的历史记忆。直到近年，由于思想的多元和网络的发达，关于“十七年”的历史叙事出现多元的状态，但主流媒体仍是历史叙述的最重要渠道之一。

“十七年”是一段离现实靠得很近的历史，因此它在“文革”时期和改革开放初期实际上并不是一个历史话题，而是一个政治话题。也正因为如此，关于“十七年”的历史叙述有着十分鲜明的政治指向，“文革”中是为了批判刘少奇，改革开放初期是为了团结一致向前看。就是到了近年，虽然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力发生变化，出现了多元叙述的格局，但对大部分人来说，“十七年”和毛泽东时代仍无法成为一个纯粹的历史话题。人们根据各自的立场和经历来叙述或者接受他们自己心目中的“十七年”和毛泽东时代，从而选择性地记忆那些能“代表”那个年代的事件或者遗忘那些不能“代表”那个年代的事件。因此，当下中国对“十七年”的历史记忆不可避免地带着强烈的主观色彩。

注释：

- 1，《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436页。
- 2，《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第91页。
- 3，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24册，第605页。
- 4，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
- 5，《人民日报》1966年10月2日。
- 6，《人民日报》1966年10月1日。
- 7，《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第143页。
- 8，《红旗》1967年第5期。
- 9，《人民日报》1967年4月8日。
- 10，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中册，第542—545页。
- 11，《在批判旧世界中建设新世界》，《人民日报》1976年2月14日。
- 12，《一个地地道道的极右派口号》，《人民日报》1977年11月25日。
- 13，《人民日报》1978年11月9日。
- 14，《人民日报》1979年9月30日。
- 15，冯兰瑞：《改革开放初期理论界的拨乱反正》，《领导者》2008年第20期、第21期。
- 16，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
- 17，邓小平语，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461页。
- 18，《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第444—446页。

- 19, 郭道晖:《四千老干部对党史的一次民主评议》,《炎黄春秋》2010年第4期。
- 20,《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第463页。
- 21,《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第449、456页。
- 22,《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册,第798—808页。
- 23,《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册,第848页。
- 24,《一个伟大历史文件的诞生》,《瞭望周刊》1981年第4期。
- 25,但学者们在讨论共和国的文学现象、史学发展这些具体的学术题目时,还是将“十七年”作为一个特定的时段。例如,当代文学史研究中,就有不少有关“十七年”文学的专题研究,而对“十七年”的史学发展,也已有学者著文予以专门讨论。
- 26,《正确认识新中国的两个三十年》,《人民日报》2009年8月17日,第7版。并参见当代中国研究所网站朱佳木的文章:http://www.iccs.cn/detail_cg.aspx?sid=617
- 27,梅宁华:《旗帜鲜明地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红旗文稿》2010年第10期。
- 28,朱佳木:《新中国两个三十年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当代中国史研究》2009年第5期。
- 29,辛子陵:《红太阳的陨落》,香港书作坊2008年,第3—4页。
- 30,张博树:《共和六十年——几个基本问题的梳理》,
<http://ishare.iask.sina.com.cn/f/7670096.html>;《“毛泽东年代”是否有“意义”》,
http://new.21ccom.net/articles/lsgd/lsgj/article_201005038818.html
- 31,周天勇:《三十年前我们为什么要选择改革开放》,《学习时报》2008年8月26日,转引自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http://theory.people.com.cn/GB/49157/49163/7727765.html>。
- 32,硬石头:《大跃进的基本思想和成绩不容抹杀——二辩大跃进》,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4/201008/175082.html>;《我们要进步到毛泽东时代:一个90后的呼唤与心声》,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21/201007/167903.html>
- 33,该网站首页上写着“公平扩大内需,正义创造财富,平等激发活力,自由享受激情”。
- 34)在1994年由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政策研究室和国家教委联合进行的民意测验中,对毛泽东是过大于功还是功大于过这个问题,高级干部中37%认为过大于功,30%认为功大于过,33%不回答;高级知识分子分别是67%、8%、25%;记者和理论工作者分别是40%、18%、34%;教职员工和学生分别是40%、34%、26%。见辛子陵:《红太阳的陨落》,第2页。

□ 原载《史林》

~~~~~

# 【史实考证】

## 《断崖夜斗杨人梗》实地考

• 樊能廷 •

被分子撞击的悬浮微粒做无规则运动的现象叫做布朗运动。江青、李讷、郝斌,不妨视作是“六亿神州尽舜尧”中的三个“悬浮微粒”。文化大革命中,“微粒”发生了“撞击”。这一撞,把郝斌这个“微粒”撞成了“反革命分子”,进了“牛棚”,在文革中度过三年有零的“牛棚”生涯,两度沿着特殊的轨迹,长期在北大历史系昌平“半工半读基地”当作“牛鬼蛇神”劳改。在太平庄,郝斌亲历也目睹了斑斑血泪、种种非人境遇,亲历也目睹了新北大公社“无产阶级革命派”的作恶。

1966年7月25、26日，中央文革连续在北大东操场召集并主持师生万众的“辩论会”，康生、江青、陈伯达，按照毛泽东私授的“圣意”，痛批张承先工作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路线、”。江青作颤音发言，抑扬顿挫、又说又哭，忽然话锋一转，“我要控诉……”，把听众吓一大跳。江青道出两桩“控诉”：一是控诉毛泽东的儿女亲家张文秋，及其女儿张少华、张少林。张少华自知婆媳不和，在东操场，没有跟着班级集体与会，而是坐在灌木丛左近，听到江青大会发言控诉张文秋，立即离场。二是控诉历史系助教郝斌“迫害李讷”——“李讷是个好孩子，去年在顺义搞四清，郝斌和万云（万里的妹妹）一起迫害她”。所谓“迫害”，据郝斌多年后解说，郝斌与李讷师生同为“四清工作队员”，就是对于某个“上中农”保管员三千多斤“黄棒子”、“白棒子”账目与实物核准不清，跟李讷意见不一致，加上工作中其他七古八杂的事儿，天天在会议上争论不已。——三千多斤“黄棒子”有账无物、三千多斤“白棒子”有物无账。“黄棒子”比“白棒子”，价格上每一斤贵三厘钱，记账会计是个刚毕业的初中生……。此外，江湖讹传，江青说不上口的怨愤是，李讷在“四清”中没有“火线入党”。李讷入不了党，无疑，郝斌“有罪”、北大校党委也“有罪”——究其原委，四清工作队来自上下左右东南西北八方，对于要求入党的“积极分子”，原则是等他们回原单位去解决，这样，即便李讷有入党要求，也只能回北大解决。

郝斌被江青说成“坏人”，幸亏他当时没在东操场，否则一定会被打斗、甚至当场毙命。郝斌躲过东操场一死，躲不过命中劫数，从此，他成为历史系“牛鬼蛇神”队伍里最年轻的“反革命分子”，开始了十年不堪回首的“被无产阶级专政”际遇。

张少华的去向，就此据实略表几句，就算补上历史这一笔：网文说张少华跑了，躲到外地去了，如何如何……。其实，情况并非如此。笔者一位南京的初中同学胡茂霞，上完南京的部队“八二护校”，毕业分配在北京的301医院工作。在江青的726东操场讲话后，张少华住进了301医院的疗养病房，用的是类别为“将军级”的“宽红带”病历。笔者这位初中同学，刚好伺候张少华。她在1966年秋天跟笔者见面聊天说，“每天开着车来探视张少华的人，络绎不绝，提着一网兜一网兜的罐头、水果来，桌上放不下，地板上都堆了一大片。”

话题回到郝斌。2014年，从北大副校长位置退休后，在台湾“大块文化”出版了一本回忆北大文革的书，叫做《流水何曾洗是非》（3），以下简称《流水》。《流水》出自亲身感受，蕴涵血泪回忆，细腻真实地描述了荒谬年代和恐怖岁月中的遭遇。郝斌的文字堪称独特隽永，叙述苦难不失风趣，描写丑陋又流露人性关怀，——不动声色地记录残忍暴力，入木三分地刻画人心与人性，举重若轻，寓理于事。很多细节的描写，显示了对于人性的深刻认识，读后令人难以忘怀。《流水》第186页写道：“如今，江青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了，这可是一个权威而稳定的职位，我的出头之日，恐怕无望了。‘时日曷丧，吾与汝偕亡！’深藏在心底的这个声音，只有我时时听到。”

尽人可知，这何尝不是亿兆受尽苦难和迫害的草民、小民、贱民深藏在心底的声音！“毒日头”的历史罪恶，罄竹难书。

《流水》按照章回体的写法，分为十九个故事，其中《转押太平庄》、《阎文儒侍师如亲》、《断崖夜斗杨人梗》、《再押太平庄》、《晚点名》、《人道的用刑？用刑的人道？》、《单兵教练》、《烂漫山花》的故事，都发生在太平庄。

《流水》第68页写道：“太平庄”，在明十三陵的定陵南面，两者相距五、六公里。这里原是昌平县绿化大队开辟的一个林场，砖房几十间，坡地八、九块，分布在几个山头

上。附近有一个三、四十户人家的小村落，名叫太平庄村，当年绿化大队初到，这里荒芜一片，没有地名，也就随它叫了“太平庄”。此前一年——一九六五年，历史系按照上面的意思搞半工半读试验。昌平县把这个林场连房带地，划归了北大。历史系一、二年级的学生走出燕园，来到这里。

关于北大昌平（历史系试点）半工半读基地太平庄的地理，校友欧阳文在《文史精华》2012年第6期48—53页《半工半读亲历记》，有详明的叙述。

为了切身认知“太平庄”地理形貌之一二，笔者于2016年入冬时节专程到这个地方去“实地踏勘”了一趟。

先说“北大200号”。笔者1963年秋天入学北大化学系，在北大六年半，对于“北大200号”耳熟能详，却是躬自未曾踏上这块土地一步。

自驾去“北大200号”，最简捷好走的路，是“八达岭高速”到“昌平西关环岛”，绕过“李闯王”马头向南的骑马铜像，拐向西、下高速路、走辅路往“南口”方向，2.7公里，见到“旧西路”右转，向北直行2公里，北向的路“途穷”，直抵“北大200号”正门。

如今的“北大200号”正名为“北京大学昌平校区”，交通条件大有改善——门前有东西向的沥青路，没画分道线，路名“南涧路”。“南涧路”东端是“涧口村”，西端推想是南口镇。校门东行50米，有公交949路“地铁昌平西山口站”。校门东行100米，有“（昌平线）地铁昌平西山口站”。

再说“太平庄”。“北大200号”门前的东西向“南涧路”，一直向西，又是2.7公里，途中要从下面钻过“G7京新高速公路”，到“太平庄路”右转，向北直行2公里，北向的路“途穷”，直抵“北京警察学院”东栅栏门。如今“北京警察学院打靶场、绿化队”，就是昔年“北大昌平（历史系试点）半工半读基地太平庄”故地。

“太平庄”位于东西走向的“坐佛山”南麓，“坐佛山”属于连绵百里“军都山”的一部分。“太平庄”周遭，山麓、坡地、河滩，地貌没什么变化。村子里没有像样的楼房（期盼拆迁？）。到处是垃圾渣土，覆盖着厚厚的杨树落叶，随风飘移。笔者访到一位马姓男村民，姑且称为“马村民”，面对面，立在寒风中聊了有20分钟，居然“发掘”到一些故实，待笔者一一道来。

“马村民”说，文革期间自己年纪小，十来岁，到处跑。太平庄村和北大没有隔墙之类，常跑去玩儿。北大在太平庄有“劳改分子”（北大的“牛鬼蛇神”、“黑帮”被当地人统称为“劳改”），七八个、十几个，不一定。多的时候，一次拉来三、四卡车人，都带着行李。“劳改”们走路排队，自动的。进屋就站成一横排，都低头撅着，墙上有毛主席像，冲着毛主席像低头撅着，也是自动的，一天三遍。有看守这些“劳改”的，年轻，手上有铁棍子，平常也不握着，是用小绳子栓着，吊在手腕上。打人、斗人，都见过，想打谁就打谁，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打。亲眼见过打“劳改分子”背上、打腿上。但是不知道夜里在“土坎儿”上斗“劳改”的事情，也没听说过。现在“土坎儿”还在，在“北京警察学院”院里，就是远远看得见的那颗松树那儿。

笔者拿出《流水》，翻到89页《断崖夜斗杨人梗》（见本刊zk1303a，2013年3月），请“马村民”看，他说“别让我看，我不识字”。笔者说，请你看这张“断崖”照片，“马村民”看了，说“没错儿，书上的照片儿就是这个‘土坎儿’。”

笔者力求过细地“考实”情况，问“马村民”能不能想起当时北大人的名字，比如头头脑脑、或者做饭的，他略作思忖，张嘴就说“xiaojianyun”，请他说说是哪三个字，他说不上来。请他再想想其他人的名字，他也说不上来——毕竟年代久远，许多事情记不住了。

凭“马村民”脱口说出的“xiaojianyun”，在网络《百度》上检索北大历史系历届学生名单，居然找到1965级果真有一位“萧建云”！笔者真真切切相信“马村民”说出的文革时期“太平庄旧事”真实，也验证了郝斌《流水》的文字叙述，真实不虚。在太平庄的北大，把燕园北大称为“南校”。“黑帮”、“牛鬼蛇神”在太平庄挨斗，从来没有像“南校”那样戴高帽子的情形发生——因为没有观众。

“马村民”说，北大用地，是“太平庄”村的，有手续——就是村支部书记盖了私章的一张借条。北大撤出“太平庄”，把这张“借条”还给村里。后来，纺织工业部用这块地儿，用几年，不用了。再后来，“北京警察学院”用这块地儿，作为打靶场和绿化大队驻地，直到如今。

“马村民”问笔者退休金多少，笔者如实告知若干若干。“马村民”说，你看，我每个月领400块“社保”，够干什么？买取暖的煤都不够。一冬天，烧十二、三吨煤，800元一吨。我每天还得做小买卖去，不然，煤都买不起。就这，我还得感谢共产党，每月给400块钱呐。你们知识分子，高级，受了那一点子苦，还要写出来。我们草民，认命了，社会就那样，打了就打了、死了就死了，现在还那样。

“太平庄”学名“北京市昌平区南口镇太平庄村”，笔者联系到村委会负责人靳主任，电话69778762。他说，事先联系一下，可以帮助找六、七十岁的人，谈谈文革时期北大在“太平庄”的旧事。

郝斌《断崖夜斗杨人梗》第89页，说到“以手指心，将心托月”，笔者释义一下。意思是杨人梗自谓一心忠诚于教育事业，个人历史清白如明月之光，期望系文革派驻的“监管人员”应该明白他的心。可是，“革命小将”高海林不论秧子、不了事，杨人梗怎么也说不清、道不明，隐痛难言，只得以手指心。郝斌《断崖夜斗杨人梗》第90页，有个词“半封”，笔者也释义一下。古代的银两，含银量不太高，官银含量93.5%，每500两为一封。“半封”对应250两，对应口语中的“二百五”，也对应“半疯”。

历史系1964级学生欧阳文、1965级学生萧建云，文革期间在太平庄住过。他们不是系文革派驻的“监管人员”，只是调养身体或者是厌恶燕园派斗，图个清净，住到了并非“世外桃源”的太平庄。当然，对于太平庄发生的事情，应该会有一些耳闻目睹。

至于1965级学生王复兴基于个人恩怨情节，在《抢救记忆》中说〔1〕，“一年级考古班肖润云，打击别人，抬高自己，争取加入‘公社’。”是不是指的本文“萧建云”，则是新北大公社同一派成员之间不为人知的另一段公案了。

什么是文革？文革就是豺狼当道、率兽食人。北大校文革当政两年多，聂孙当道，周围麋集一批恶徒，不遑多让地率兽食人，举其有名的校内受害者，温家驹、殷文杰、刘玮，还有陈一咨、樊立勤、邓朴方、戈华…。食人之兽则有高海林、聂玉海、王刚、杨恭谦、郭玉

堂、陈乃斌、赵恩普、宴懋洵、蒋其宝、倪永康…。其中高海林，是“茶馆的水烟袋——万人衔（嫌）”。《抢救记忆》的作者王复兴说（2）：“高海林比笔者高一个年级，我的同班校友王渊涛文革后与我说到高海林时，张口就说‘这个人左得很。’他与我的印象相同。”寥寥数语，高海林之品性，可见一斑。

注释：

1 王复兴，《抢救记忆》，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6年10月，138页。

2 王复兴，《抢救记忆》，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6年10月，81页。

3 郝斌：《流水何曾洗是非》，大块文化出版公司，2014年，81页。

~~~~~  
【往事非烟】

“特种兵”的晚岁思考
《拒绝遗忘——北京老五届在插花庙的岁月》序

• 张宝林 •

人们都知道，上个世纪，地球上发生了两场惨绝人寰的大悲剧，这就是两次世界大战。第一次持续4年，死亡1000多万人，第二次持续6年，死亡5000多万人。除此之外，大约人们也不会忘记另一场大悲剧，这就是中国的十年浩劫——“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是发生在和平时期的比世界大战更加残酷和荒谬的一场战争。这里并不曾爆响塞尔维亚志士刺杀奥匈帝国王储的尖厉枪声，也没有发现纳粹德国秘密派往但泽港的特洛伊木马，但是，为着一个虚妄的政治幻觉，党中央主席一声令下，960万平方公里的广袤疆土立即陷入政局动荡、经济停滞、市场萧条、社会失序、民族自戕、文化毁灭、人性泯灭的十年沉沦。

这十年是两次世界大战持续时间的总和。文革中的非正常死亡人数虽然没达到二战的规模，却是一战的两倍，殃及人口更高达一亿。2000万，一个亿，这两个数字并非向壁虚构，而是叶剑英副主席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公开披露的，时间是1978年12月13日（见董宝训、丁龙嘉着《沉冤昭雪——平反冤假错案》第1页。安徽人民出版社2003年4月第2版）。

这场历史悲剧结束已经35年了，文革研究在世界上已经成为一门显学。关于它的起源、沿革、核心人物、历史事件、悬疑、影响，以及经验教训，世界上早有许多学者，从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文化学，甚至民族学、人类学、心理学等各个方面进行深入研究，并取得了丰硕成果，但十分遗憾的是，目前世界上在文革研究领域最具影响力的机构不在中国本土而是在美国，在我们这片国土上，文革研究尽管已不再是空白，但似乎并未完全解禁。这块全民族的心病，依然折磨着我们的灵魂。

其实，早在文革结束后的第五年，即1981年，中国共产党就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用五分之一的篇幅论及文化大革命，其主要结论是：

“一九六六年五月至一九七六年十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同志发动和领导的。

“‘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这些论点对当时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估计，是完全错误的。

“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它根本不是‘乱了敌人’而只是乱了自己，因而始终没有也不可能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它必然提不出任何建设性的纲领，而只能造成严重的混乱、破坏和倒退。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这场“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文革虽然早已结束了，但它的“遗毒”还在，正像一个病灶未除的巨大疽痈，虽然表面已经平复，终究还是隐患。现在有一些人怀念文革，竟把解决当前社会尖锐矛盾的法宝押在第二次文化大革命上。这难道还不值得警惕吗？这些年，国内出版的党史、军史、国史汗牛充栋，但是，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见到一部在国内外产生重大影响的、专门论述文革教训的专著，就连反映文革的小说、电影、戏剧，也寥若晨星，屈指可数，仅有的那一、二十部，也大多是早些年的作品。

对于文革的深度反思，绝不不仅仅是政治家、史学家、理论工作者们应做的事，也是每一个公民应做的事，对于亲身经历过文革全过程的人来说，尤其负有一份神圣的责任。我们相信这种全民族痛苦而真诚的反思和自省，大大有利于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民族救赎和国家振兴。

我们这群文革中期毕业于北京八大院校、后来被命运抛到安徽一个叫插花庙农场的400多名大学生，正是被裹挟着参与了文革全过程的人，而且在一段时间里，我们还处在文革的“风暴眼”中。我们有过认真反省和重新检视那段历史的冲动和思考，但我们缺少一个契机，一个由头，现在，这个契机和由头来了

我们这个群体是1970年形成的，那一年的初春，北京大学250多名63、64、65级毕业生，清华大学30多名64、65级毕业生，从蚌埠火车站集体列队，向隶属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安徽省独立一师的阜阳插花庙6377部队农场进发。

8月，包括笔者在内的中国人民大学、北京政法学院、北京广播学院、北京体育学院、中央财经学院、北京语言学院等六所大学的100多名毕业生，也陆续加入这支队伍。

这批当年被贱称为“臭老九”的“旧学校毕业出来的学生”，组成了一支特殊的6377部队学生营，既是被迫又是自觉地进行着艰苦的磨练和改造，先来的一年，后来的一年半，然后再分配到全省各地工作，开始他们踏入社会的长征。

自此之后，我们与以下关键词：插花庙，学生营，81、82、84分队，融汇成了一支特殊环境下的“特种部队”，我们便是这支“特种部队”的一批非工、非农、非兵、非学的“特种兵”。通过我们这些活生生的标本，世人或许可以触摸到当年一个持续发烧40度、病情延续十年之久的庞大病躯的脉搏，从而做出恰当的病症分析和病因判断。

去年，我们这些“特种兵”的部分战友40年后相聚合肥，重温旧梦，几位同学不约而同地提出编辑一本回忆文集的设想。这倡议立即得到更多战友的赞同。

回忆文章怎么写？

大家的共识是，应主要记述自己在部队农场“接受再教育”时亲历的事实，越具体越好，越准确越好，细节越多越好。文革悲剧必须正视，各种荒诞和丑陋都必须记录在案。知耻近乎勇，承认事实，是反思、批判和彻底诀别罪恶的前提条件。历史是全民记忆，在正襟危坐、冠冕堂皇的官修正史之外，应有大量的、细碎的、鲜活的民间稗抄予以补充。

聚会结束后，几位热心的战友接受大家的委托，很快就建起一个工作班子，向各地战友寄发了“征稿函”，开始了紧张的筹备工作。

战友们踊跃参与的热情是出乎预料的。短短几个月，筹备组就收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40多篇文章。这些文稿中，主要写我们在农场一年多的共同经历、遭遇和感受，有的长篇大论，写了农场生活的方方面面，有的短小精悍，写了自己对往事的点滴回忆；有的以写事为主，有的以写人为主；多数是记叙文，也有诗、词、日记等体裁。

尽管文风各异，感受有别，甚至还有一些不同观点，但都是大家的倾心之作、肺腑之言，说的都是真人真事和真情实感，字里行间，跳动着—个“真”字。

夜深人静，披览这些浸润着青春激情与乱世感触的文字，在农场经历过的那一幕幕场景，又都浮现在我的眼前。我仿佛穿越时间的隧道，回到了那片曾经洒满我们的汗水和泪水，我们那么熟悉又那么陌生的土地。

我预感，这将是一本很有价值的书。它像一幅工笔长卷，为世人提供了文革中期许多具体而微的历史细节，描摹了一片丰富多彩的时空背景，在那沉甸甸的叙述后面，我也看到了一粒粒闪烁着耀眼光芒的理性思维的结晶。

这本书可作为文学作品赏读，也可当作文史资料研究，更可看做是一个特殊时代知识分子群体的自画像和心灵史。还有一点并非不重要，这些年，老干部、老知识分子、下乡知青、中学老三届红卫兵等各界人士的文革遭际，都曾有人写过回忆文章或文艺作品，有的还拍成了影视作品，唯独对“老五届”（61届至65届）大学生很少有人写，这段历史的断层，这个历史的遗憾理应由我们自己来弥补。

正如一千六百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文革期间解决“失业”问题的权宜之计—样，连续三届—、二十万大学（不含大专）毕业生，在1970年春夏，集中发配到农村、厂矿、边远基层、部队农场“接受再教育”，其实也是正常社会秩序被彻底颠覆后，缓冲就业难题的无奈之举。

据北大、清华的同学回忆，这几届大学生的分配方案，是由国家计委负责制定的，原本先后出台了两个方案，但都被“四人帮”及其爪牙否定，最后的方案是“四个面向”：面向农村，面向工厂，面向基层、面向边疆。国家和家庭花了巨大代价培养出的青年学子，被投闲置散，多年学成的专业知识没有用武之地。

—方面是经济停滞，科研断档，—方面是业务荒芜，人才废置。正如本书的—位作者所感慨的：“这些人本可以制造出原子弹氢弹，可以探测宇宙，可以研究生物工程，造福人类等等，但在那荒唐的岁月，由荒唐的人来执行荒唐的决定，只能上演荒唐的悲剧。”（章青《那年那月那地那人》）

“6377特种部队”的短暂历史，印记着文革的荒诞与迷失。“6377特种兵”这一滴水，映照那个怪诞时代的诡异风云。

文革是从北大聂元梓的“第一张大字报”开始的，北大、清华是文革试点“六厂二校”中的那两所名校。曾几何时，聂元梓已成为文革新贵的阶下囚，而文革中受到伟大领袖八次接见的两校和其它高校的大批“红卫兵”，则被发配到农村、农场劳动改造。从“革命小将”到“臭老九”，原来不过一步之遥，正像多少开国元勋一夜之间就成了“牛鬼蛇神”。这就是所谓的“革命”，这就是所谓的“史无前例”，倒转乾坤。

中央的理论权威“两报一刊”社论反复告诫人们，文革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人人都要过这一关。“走资派”触及灵魂，必须戴高帽游街、坐“喷气式”挨斗、关“牛棚”劳改；知识分子触及灵魂，必须放下书本、笔杆、仪器，到干校种地、耕田，到厂矿当清洁员、锅炉工；大学生触及灵魂，就必须到基层，接受超出精神和体力极限的劳动锻炼，以脱胎换骨成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新人。

人们不会忘记那些政治铺张和形式作秀，红海洋的铺天盖地，“三忠于，四无限”的唱诵无边，“天天读”、“忠字舞”的愚钝疯狂；不会忘记明火执仗的谋杀，莫须有的诬陷；不会忘记堂堂国家主席的遗体蓬头垢面、光着脚板，连个名字都没有就被匆匆火化；也不会忘记张志新、遇罗克们仅仅因为政治观点不同就成为死囚。社会上的所有这些迷乱荒唐，在“6377特种部队”都可以找到影子。

“对毛的崇拜在继续中，在农场里，只要哪天广播电台播出一段毛的最新指示，部队就要求学生连夜到周围的村子里去把在睡梦中的农民唤起，向大家报喜、宣讲。村里连电灯都没有，可怜睡眠惺忪的农民能听懂什么呢？其实我们也不懂这‘最新最高指示’是干嘛的。”（朱听如《在6377前后的日子》）

“在农场，除了高强度的体力劳动，就是漫漫无尽的政治思想学习。当时的学习，往往要自己批判自己，找出一两段主席语录，将一些鸡毛蒜皮的所谓‘活思想’暴露一下，上纲上线，批它个狗血喷头，就算是觉悟有了提高，学习有了进步和成效，就能得到‘左宝宝’的肯定和表扬。”（杨德兴《部队农场生活杂忆》）

“有一个班的班长，在繁重劳动之后，大多数人鼾声如雷，她还打着手电筒躲在被窝里学毛选，第二天她的劳动劲头特别大，连里大肆宣传，要大家向她学习。有的同学同我议论，认为这是弄虚作假，实在没有提倡的必要。不知为什么，我们在私下议论的问题都传到部队领导那里。由此领导把责任推到我的身上，认为我有政治问题，是阶级斗争新动向，是改造与反改造的斗争。于是，对我进行了公开或非公开的批判，施压，孤立，打击。”（董立坤《真理正义人类的良知是永远不灭的火光》）

鲍寿柏的文章，讲了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故事。他刚到农场不久，就被农场领导找去，原来是一封邮局革委会寄来的检举信，揭发他竟敢把邮票贴在毛主席语录上，遮挡了毛泽东思想的伟大光芒！这可是个足以致人死地的罪名，多少人曾因喊错了一句口号、写错了一个标语而身陷囹圄甚至人头落地。幸亏农场领导还算开明，教训一通了事，但邮局那帮造反派神经质的“本能反应”和猎犬般的嗅觉，却让人不寒而栗。

在文革时期，人性是绝对的贬义词，凡是和“人”字沾边的什么人性、人情、人道，都是资产阶级的臭狗屎。人们不能谈亲情、温情，更不能谈爱情，人人都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孙悟空。一进农场，部队干部就宣布了三“不准”：一不准回家探亲；二不准谈恋爱；三

不准结婚。如果说后两个“不准”还勉强可以成立，头一个“不准”就是泯灭人性的混账逻辑了。

正是这个混账逻辑，在“6 3 7 7”制造了一个又一个悲剧。

一位同学是江苏南通人，母亲病危，父亲打电报叫儿子回家，连部压下电报，封锁消息。母亲苦等几天，也没把儿子盼来，真正是“死不瞑目”。母亲去世的第三天，他才回到家中，家人都不谅解，他无端背负了读书忘本的恶名。

另一位年纪较大、已经成家的同学，儿子在家被拖拉机撞伤了，连队没同意他回去，母亲因此生病了，还是不让回去，最后爱人为此犯了病，他终于忍无可忍，自行打道回府。

更惨的是是一位叫印根明的同学，母亲病重，打来电报，部队领导照例怀疑是“谎报军情”未予理睬。第二次又来电报，他当面向营长求情，也遭拒绝。第三封电报传来噩耗，他终于得以回家，竟得知是他的迟迟不归，让母亲绝望自杀。

这是任何一个文明社会都难以想象的人生惨剧。他心中愤懑，回部队后难免啧有烦言，谁知，这又被批为“小资产阶级思想、不能正确对待个人利益和革命需要、对部队再教育有抵触情绪”，并作为“阶级斗争新动向”组织全连批判。

尊长爱幼，孝敬父母，是中国的传统美德，何况母亲生了重病，怎么就不能回家看看？此事给印根明造成了终身痛苦，至今也难以平复。

文革是一场浩劫，是“乱了自己，惊呆世界”的全面失序。农场里存在的专断、冷漠、蛮横、瞎折腾等种种弊端，其实也正是整个文革极“左”、偏执、变态的缩影。

拉练，是军训的重要内容之一，昼夜兼程，急行军150里，学生走得一点不比战士差，但正式拉练前，一夜三五次的“小拉练”，就是故意整人。特别是不少女生，特殊生理状况下刚躺下又被赶起，其狼狈境况可以想见，她们成了改造者恶作剧的牺牲品。

团部放露天电影，是学生们仅有的娱乐。但这娱乐不过是放那些老掉牙的“老三片”——“地道战”、“地雷战”、“平原游击队”和八个样板戏。一旦放电影，学生分队必须打着背包跑步到放映地。有时候连放两部片子，回到营地已是凌晨两三点钟，还要组织讨论一小时，第二天6点半起床，7点下地干活，“一夜只能睡两小时”。

不少同学记得，到农场不久，就接到命令，到颍河参加游泳训练。学游泳是好事，但不管有无基础，几天之内必须学会，最后还得参加连续游3000米（或10000米）的考核，这种训练方法让人瞠目结舌！一些从来没下过水的同学，被煮饺子似的扔进河里，喝水也好，抽筋也好，连续四五个小时不许上岸。虽然最后没有出人命，但如此野蛮训练，给这些年轻心灵留下了浓重的阴影。

冬天修水利挖河泥，无论男女，都要踩着没脚踝的冰水，一天干十几个钟头，一些女生因此落下了病根。1971年春节，贫下中农都让休息几天，放鞭炮过年，学生分队却要过“革命化春节”，不放假，连日挖沟。

夏秋“双抢（抢收抢种）”，是“再教育”超限试验的范本。农场明明有收割机，却不让学生分队使用。管理人员甚至把学生当“劳改犯”驱使，完全不顾有些人在学校就是“全

休”病号，有人患风湿性心肌炎、肺结核、患腰疾、患血吸虫病。在“一律不准请假”的律令下，大部队连续作战，有时24小时连轴转，严重摧残了学生们的健康。

据一个同学回忆，他因心肌炎下不了床，有一天没有参加劳动，军人排长竟把一个班的学生叫到他的床前进行大批判，后来找来军医检查，才准假休息。

另一位回忆，他们连队许多人生病，指导员拿着温度计给病号们测量体温，低于39度的不算病，必须干活，超过39度的也不许休息，要集中学《毛选》。他回忆，病号们宁愿下地干活，也不愿学《毛选》。还有位同学统计，每个“双抢”季，都有大约三分之一的学生病倒，除了劳动强度太大，跟淮北当地生活环境差，蚊虫猖獗，“双疾”（疟疾、痢疾）流行也有很大关系。

这本书，无疑是“臭老九”们对文革经历的回顾和反思。这种40年后的回顾和反思，已经少见年轻人的激愤和冲动，而多了老者的冷静、理性与平和，正同摄影中的黑白照片，没有浓烈的色彩，全靠画面上巨大的黑白反差，就足以发人深省。我想，如果将来真有那么一天，巴金老人关于建立文革博物馆的提议得以实现，这本书里提到的案例，完全有资格进入馆藏。

更加难能可贵的是，这本专门记述知识分子接受“再教育”的书，展示的不仅仅是磨难和痛苦，还有令人动容的真、善、美，闪光的理性和智慧，以及一代知识分子面对逆境勇敢捍卫自身尊严的无畏精神。

请读者注意书中的几个著名“事件”，其实这正是人与制度之间激烈冲突的迸发。毕竟，凡是有点正义感的人，都不能无视公理被公然践踏、良善被野蛮摧残。

“七班事件”，源于印根明母亲的非正常死亡，同学们不满部队领导“不准请假”的决定，公开同情和支持印根明，这引起刚愎自用的领导们的弹压。他们上纲上线，把正常的意见反馈，上升为“阶级斗争新动向”，并力图利用这个事件，把学生们很克制的反应彻底摧毁。

这引起了同学们的更激烈的反弹。在长达数旬的抗争中，学生们团结一致，巧妙地采取“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策略，用领导漠视“贫下中农学生”的合理要求，导致“贫下中农母亲”非正常死亡的恶果，指斥部队领导“缺乏阶级感情”，“马列主义对外不对内”，反驳了“阶级斗争新动向”的谬论。

这种反抗虽然是有限的，但也是有理有利有节的，它的影响超出了“七班”，扩大到了排、连。这次事件以整人阴谋黯然收场告终。

更为悲壮的是“李明事件”。李明是北大学生，他熟悉军队的制度和管理，他认为学生营这些折磨人的“高招”，都是连营干部的“发明”，目的是创“业绩”，以便提职晋升。他说只要制造一些事故，就能让他们的美梦破灭。

于是，他先是拒绝参加劳动，被当做重点批判对象实行监管，后来决定“以身试法”当“逃兵”。部队派人把他押回，他半路再次脱逃，此事惊动了省军区，军区经过调查，认为学生营的做法简单粗暴，学生营部因此挨了批评。此后他们果然有所收敛。

我们曾经年轻，在那充满苦涩和伤感的日子里，青春的活力曾为我们枯燥的生活注入脉脉温情。不少文章回顾了在那么艰困的条件下，同学们是怎么样的相互关怀、支持与帮助；回顾了在绝对禁欲的环境中，爱情是如何悄悄孕育和萌生；还有那些无师自通的自我保护和生存技巧，偶遇机会就即刻喷薄的运动天赋、艺术才情……读来都让人百感丛生。

在农场的日子里，我曾数次被抽调到师部工作，还承担过为样板戏画布景的任务，但直到看了几位战友的回忆文章，我才第一次了解82、84分队排演样板戏《智取威虎山》、《红灯记》的详细过程。

我们这支400人的队伍，接到演样板戏的命令之后，居然很快选出了合格的少剑波、杨子荣、座山雕、李铁梅、李奶奶，挑出了称职的导演、美工、乐队，还能做到在极短时间内上演，达到令周边军民惊叹的准专业水平，这是一支什么样的队伍啊！

缅怀这些往事，谁能不感慨：在这三届毕业生中，有多少藏龙，多少卧虎，如果不是这场浩劫，他们能为祖国和人民创造出什么样的辉煌业绩？！

离开农场的这40年时间里，国家已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为祖国取得的每一个进步而欢欣鼓舞，也为现实存在的众多严峻的经济社会问题，如贫富差距拉大、社会分配不公、贪污腐败、道德滑坡、诚信缺失、资源浪费、环境污染，以及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而忧心忡忡。今天，我们在这里还原历史，揭示疮疤，并不是要算旧账，恰恰是为了更好的面对当下，面对未来。

“6377农场”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小白鼠，通过对它的剖析，可以窥一斑而知全豹，更好地看清那场亘古未有、不可思议、荒诞之极的“文化革命”的真面目。

“革命”一词，典出《革卦·彖传》：“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说的是公元前商王汤讨伐夏桀，周武王讨伐商纣，都是顺应天意，符合民心的事情。这里的“革”即改变，“命”即天命。

古代的君主叫做“天子”，是受命于“天”的，所以改朝异姓，把天赋予的权力从这个君王转移到另一个君王，是改变“天命”的行为，这是神权政治观对“革命”的解释。古希腊时代，一些哲学家也把“革命”，看成是推动社会变革，实现正义和恢复秩序的的历史过程。

从古至今，人们说到“革命”，大多把它和“暴力”和“正义”联系在一起——“革命”就是用暴力手段实现公平正义。

现代意义的“革命”，是从日语来的，经过改造、演进，已少了暴力的因素，多了变革的涵义。比如，日本人把明治维新也称为“革命”，而明治维新基本是政治变革，而非暴力革命。

无论站在东方或西方的立场，用古意或今意解释，“文革”都和“革命”沾不上边，原因很简单，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专制主义闹剧。

我们在6377农场的遭际，是一种遵照“最高指示”实施的集体流放，是军人监督下的强制改造，是禁锢思想、野蛮役使、灭绝人欲的苦役，是强权者的颐指气使，是“劳改犯”的逆来顺受……这些，都与“革命”毫无关系。唯一挂上钩的可能就是“暴力”了，虽

然不是硬暴力，而是软“暴力”，但暴力之后，公平正义全无。人们见到的，只是“暴力”阶段的疯狂、混乱、畸形、荒诞和失序。

当代著名经济学家、政治哲学家、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在二战尚未结束的1944年，就写出了挖掘专制主义老根的名著《通往奴役之路》。他在书中说：“现在首要的是，要把我们自己从那种最坏形式的当代蒙昧主义中解放出来，这种蒙昧主义试图使我们相信，不久以前我们所做的一切不是做得明智，就是非做不可的。在还没有领悟到我们做过了许多蠢事这一点之前，我们将不会变得更为明智。”（【英】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著《通往奴役之路》，王明毅、冯兴元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8月第一版）

我们必须承认，中国的专制主义传统根深蒂固，我们曾经长期处于蒙昧主义的泥潭中不能自拔。史无前例的文革固然是蒙昧主义的样板，但在此之前，我们做过的“蠢事”还少吗？“反右”的“阳谋”，把55万知识精英打成异类，发配到北大荒、夹边沟那样的荒蛮之地一去20年；紧接着是“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大炼钢铁、砍树烧山、吃大锅饭，种万吨田，最后“三份天灾，七分人祸”，造成饿毙几千万人的惨剧；一年后，彭老总为民请命，在翔实的调研之后，说了真话，却犯了龙颜，马上被打成莫须有的“反党集团”和“军事俱乐部”，革职流放，从此淫威之下，天下噤声。

领袖“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阶级斗争理论，成了泱泱中华的定海神针！如此荒唐透顶的事件，一而再，再而三，居然几亿民众手舞足蹈，亦步亦趋，山呼万岁，像得了魔症一样跟着起哄，这种蒙昧主义，真正是举世无双，登峰造极。

蒙昧主义是万恶之源。蒙昧主义非彻底打倒不可。

揽镜可正衣冠，读史可知兴替。这就是我们编辑这本书的初衷。我们愿以自己的微薄之力，拂去这面镜鉴上的浮尘，让它映照灿烂的时代辉光。

文革十年，我们这代人一生最美好的时光，已在西西弗斯式的“无用功”中虚掷了。我们唯望这样的荒唐不再发生，这样的悲剧不再重演！

是为序。

□ 摘自《拒绝遗忘——北京老五届在插花庙的岁月》，鲍寿柏、张宝林主编，海天出版社，2015年1月

~~~~~

## 【书刊评论】

### 《文革时期中国农村的集体杀戮》中文版序

• 苏 阳 •

与对了解那段历史的渴望形成对照，从中文读者的角度来看，对文革的研究作品处在稀缺的状态。比较容易上手的书，往往都是通史类或者个人回忆录方面的。对一个专题或者一个地方的研究，相对就少。（1）这种贫困，固然有我们熟知的政治原因；由于技术层面和商业层面的原因，通过港台出版文革研究也面临困难。

这个困难是翻译。海外从事文革研究的学者不少，作品其实也丰富。但是对中文读者来说，有语言的阻隔。谁来翻译呢？谁既有历史社科知识，又有良好的文字功底，更重要的是能拿出时间来？翻译一本书需要的时间和心血，恐怕与写一本不相上下。出版社拿不出翻译费，因为出版学术书本来就赔钱。由于在发行和推销上的限制，关于文革的书也如此。所以这本书今年跟中文读者见面，一是归功于译者宋熙的学术兴趣，二是归功于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的识见。可惜还有很多文革英文专著，一直还留在英文世界。让我提到若干，既表达我的尊敬，也提供一个背景来理解拙著的内容和风格。

在研究文革的英文著述中，我最推崇若干描述地方文革的专著。魏昂德（Andrew Walder）的《张春桥与上海的一月革命》把上海市委的人物写得栩栩如生。精英纠葛连动群众派系，地方冲突领军全国风潮，从而引发了影响深远的上海夺权事件。李鸿永（Hong Yung Lee）的《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政治》，也出版于1978年，以北京和广州的红卫兵为描述主体，映像了全国城市文革的脉搏。该书提出的试图解释派系形成的理论问题，一直激发着经久不衰的争论。同一个年代出版的还有骆思典（Stanley Rosen）的《红卫兵派系和广州文革》（1984），聚焦广州中学生运动。九十年代出版的有王绍光的武汉研究《超凡领袖的挫败》（1995）和裴宜理（Elizabeth Perry）与李逊合著的上海《无产阶级力量》（1997），堪称这一传统中两部最为详实精彩之作。前者有王绍光亲历武汉对当事人的大量采访，后者有李逊掌握的上海工会历史档案。最近新出版的有魏昂德的北京红卫兵研究《分裂的造反》（2009），是这批经典的最新奉献。作者多年搜索积累，对于北京红卫兵的文字记载可谓皓首穷经。（2）

如果通史往往流于宏大而空泛，上述这些书则细述人物、地点、时间、事件，读起来近似章回小说。如果个人回忆录的视角过于偏窄，这些书则聚会了诸多力量的交织，呈现大中型规模的政治社会互动全景。比如，裴宜理和李逊的上海故事，诸多细节中包含了普通党员王洪文的崛起。1966年6月的一天，王在上棉17厂贴出平生第一张大字报，这一行动给他个人、上海以及整个国家带来了深远影响。（3）又比如，王绍光详细记述武汉保守派和造反派的形成，进而探讨造反派内部的温和派和激进派的分野。关键人物和关键细节很丰富。王这样记述著名武汉“七·二〇”事件前夜：

破晓时分，约200个保守派组织成员冲入东湖宾馆，当面质询谢富治和陈再道。因为谢富治与王力的表现有所不同，一直以来对百万雄师和武汉军区没有什么批评，所以开始群众代表跟谢谈判进行得较顺利。双方同意下一步由王力和谢富治接见保守组织，群众因此撤出宾馆。但是当王力走出他的房间，混乱再起，又有由8201和8199部队士兵为主的几百名保守派群众冲进宾馆。起先他们中一些人误把陈再道当作王力，用步枪枪托打他。等搞清楚了谁是王力之后，开始围攻王力。此时钟汉华跪在地上，哀求他们放开王力。（4）

这些书所昭示历史意义和理论意义，也是通史和回忆录所不及的。寻常书写，往往局限于解读领袖，记载悲剧，或者谴责制度。可是文革之为文革，因为有千千万万的人自愿自觉地、豪迈激昂地参与。为什么这么多人会去做现在看来几乎是不可思议的事情，给他人和自己带来种种损失和伤害？上述这些书，直接或者间接，提出并且试图回答这个问题。里面的主要人物不是毛泽东、江青等等最高层，而是曹轶欧、潘国平、聂元梓这些中层人物以及千万下层群众。文革既是毛泽东的运动，也是普通人的运动。普通人的所做所为和行为逻辑，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理论意义。

拙著是沿承上述著作的传统写出来的——它是关于地方文革（以广东和广西为主），它讲述远离北京的故事，它有人物和故事情节，它的理论焦点也是普通人的行为。但是跟上述各书相比，拙著有几点不同。

第一，上面各书讲述的文革都是发生在城市，而这本书写的是农村。

第二，虽然我也写到了文革的各个阶段，但是我的重点是在1967—1968各级革命委员会成立前后，对所谓“四类分子”的屠杀。

第三，如果说上述名著的文体是地方文革的小通史，而拙著的文体则是集中于一个专题而进行的。地点上以两广为主，又不局限于两省；时间上以文革为主，又追述文革前毛体制的形成过程。

对大规模的屠杀，早先已经有郑义的《红色纪念碑》、香港《开放杂志》上章成对道县一案的详细报道，还有对北京大兴县红八月大屠杀的记载，以及对发生在云南、内蒙等地类似事件的报道。（5）

我的工作，一是用一千五百多本县志所提供的数据与事实更大范围地看这个现象的普遍性。我的研究进一步支持了郑义等先前作者的报道，并确定它是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在本书英文版出版后，由宋永毅主编、于2016年出版的关于广西文革官方调查报告新数据，更加确定了这个悲剧的存在、广度和深度。（6）二是进入田野，通过对受害人和当事人进行访谈，理解当时出现这个奇特现象的社会条件。为什么普通村民在没有人强制的情况下，自愿自觉地去滥杀无辜？简单的回答是阶级斗争。但是，什么是阶级斗争？阶级敌人的概念是如何来的？拙著重新构建了从1949后的解放和土改到文革高潮的历史，记述村民怎么建构“他者”群体，怎么争当积极分子，怎么看待约束杀人行为的法律，怎么把和平时期的一个乡镇、一个村庄理解为战时环境，进而可以把邻里当做“敌人”。

半个世纪后的今天，中国还不是一个以法治国的国家。公民还会在司法程序之外受到以国家公权名义施行的拘捕、暴力和裁决。广大公民一般都不会去质问国家给予的这些罪名是不是可以成立，而是盲目地为国家引导的群众行为喝彩。如果毛泽东时代的帽子是“地主分子”、“走资派”、“当权派”，当代的“坏人”有了新的名堂……，此外还有各种各样的“分子”。每当新一轮开始，人民欣然支持，没有要求国家把涉及人身自由的暴力行为纳入法律轨道。所以文革的回响从未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消失。都说文革是因为愚昧造成的，如果没有深入的研究，我们恐怕永远不会明白愚昧在什么地方。伟大的乔治·艾略特这样说过：

常言说知识就是力量，殊不知愚昧也是力量。知识去慢慢建造，愚昧来顷刻毁灭。知识的力量在于真，在于谨慎，在于辨别，在于分开或然和必然；愚昧则是一个乱冲乱撞的瞎眼巨人，玩弄文明的基石于鼓掌，恣意而为，把欢乐之所埋葬于深渊。（7）

此书翻译历时二年有多，是译者宋熙利用她的业余时间完成的。我感激之余，也为其精神感动。我没有能够对译稿进行校对；这一定给译者和编辑增添了很多细微而繁杂的工作。感谢中大出版社的甘琦、林颖、林骁和其他编辑的辛苦。感谢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熊景明老师给我与中大出版社牵线。

为了保护被采访人的匿名性，书中对被采访的对象以及他们所在的地名，用假名。对已经见诸出版物文献的人名地名，则用真名。第一章和第九章有些十分铺排的理论讨论，对学术圈外的读者来说可能显得生僻抽象，可以跳过不读。

苏阳 2016年于美国加州尔湾

作者介绍：苏阳，2003年获斯坦福大学博士学位，现任加州大学尔湾分校社会学副教授。

注释：

〔1〕在此处说到“稀缺状态”，只是相对而言。笔者在文革研究中深深得益于中文作品。我对广州文革的理解，参考了海枫所著《广州地区文革述略》和刘国凯所著多卷《人民文革丛书》。广西方面，官方出版过《广西文革大事年表》、《南宁市文化大革命大事记》等等一些详细调查报告，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图书馆有藏。对我写书有直接帮助的还有下文要提及的郑义和章成等等。帮助我了解文革其他方面的中文著作甚多，只能略举几个作者：印红标、唐少杰、徐友渔、马继森、宋永毅、王友琴、王年一等等。

〔2〕Andrew Walder, *Chang Ch' un-ch' iao and Shanghai's January Revolution* (Ann Arbor, Michigan: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of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78)。Hong Yung Lee, *The Politics of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A Case Study* (Berkeley,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8)。Stanley Rosen, *Red Guard Factionalism an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Guangzhou (Canton)*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82)。Wang Shaoguang, *Failure of Charisma: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Wuhan*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Elizabeth J. Perry and Li Xun, *Proletarian Power: Shanghai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Boulder, Colorado: Westview Press, 1997)。Andrew Walder, *Fractured Rebellion: The Beijing Red Guard Movement*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2009)。上述各书中只有王绍光的武汉研究被翻译在香港出版；中文书名为《超凡领袖的挫败：文化大革命在武汉》（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9）。

〔3〕Perry and Li, *Proletarian Power*, p. 45. 中文是苏阳的翻译。

〔4〕Wang, *Failure of Charisma*, p. 154. 中文是苏阳的翻译。

〔5〕郑义：〈两个文革刍议〉，《华夏文摘》增刊，1997年第83期，页1—14，[www.cnd.org](http://www.cnd.org)，2003年8月23登入。郑义：《红色纪念碑》（台北：华实文化公司，1993）。郑义：〈广西吃人狂潮真相：流亡中给妻子的第八封信〉，《华夏文摘》增刊，1993年第15期，[www.cnd.org](http://www.cnd.org)，2003年8月23登入。章成：〈道县大屠杀〉，《开放杂志》，2001年7、8、9、12月四期连载。遇罗文：〈北京大兴县惨案调查〉，载宋永毅主编：《文革大屠杀》（香港：《开放杂志》社，2002）。张连和：〈五进马村劝停杀〉，载者永平主编：《那个年代中的我们》（呼和浩特：炎黄出版社，1998）。宋永毅主编：《文革大屠杀》（香港：《开放杂志》社，2002）。

{ 6 } 宋永毅主编：《广西文革机密档案数据》（3 6 卷）（纽约：国史出版社，2 0 1 6）。

{ 7 } George Eliot, Daniel Deronda (New York, NY: Alfred A Knopf, Inc. , 1999) , p. 246. 中文是苏阳的翻译。

---

|                                                                                                                        |             |          |
|------------------------------------------------------------------------------------------------------------------------|-------------|----------|
| 本期编辑：                                                                                                                  |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 《CND》总编： |
| 华新民（美国）                                                                                                                | 思语（美国）      | 陈天寒（美国）  |
| 《华夏文摘》网址： <a href="http://www.cnd.org/">http://www.cnd.org/</a> ，国际刊号 ISSN 1021-8602                                   |             |          |
| 投稿专用地址： <a href="mailto:tougao@cnd.org">tougao@cnd.org</a> 其它事项请电邮： <a href="mailto:cnd-cm@cnd.org">cnd-cm@cnd.org</a> |             |          |

---